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徐敏 编著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 (上)

The Pictures Catalogue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Modern China

江苏美术出版社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顾问 : 马英林 傅先伟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

The Pictures Catalogue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Modern China

(上)

徐 敏 编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全2册 / 徐敏编著.
--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44-5528-5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基督教-教堂-中国-近代-图录 IV. ①B97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677号

出品人 周海歌
责任编辑 毛晓剑 郑 晓
装帧设计 赵宝伟 刘莉瑶 彭仔云
图片摄影 徐 敏 彭仔云 钱建明
英文翻译 赵泉泉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朱晓燕

书 名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上、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版印刷 上海锦良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12
印 张 58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5528-5
总 定 价 980.00元（全套二册）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7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

丁光训



作者简介

Author brief introduction



徐敏

xumin

1963年生，199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6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美术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201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同时兼任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学会理事、江苏省华夏天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等职。

其基督宗教教堂建筑方面发表的论文有：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概述》

《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基督教堂》

《象征主义与现代基督教堂》

《基督教堂建筑室内设计辞条》

近年来有关教堂建筑及室内设计获奖的有：

苏州狮山基督教堂	2006年获第六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金奖
金陵协和神学院大教堂	2007年获IFI国际室内设计大奖赛一等奖
	2007年获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一等奖
温州状元镇石坦基督教堂	2008年获第七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金奖
温州龙华基督教堂	2009年获江苏省第七届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特等奖
苏州独墅湖基督教堂	2010年获第八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银奖
南京基督教圣训堂	2011年获江苏省第八届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特等奖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建筑作为人类文化历史在空间的凝固有着太多的精神蕴涵，宗教建筑在表达这种意境上则尤为突出。在我几十年的宗教研究中，对宗教建筑所表现的空间艺术之非凡超拔，总是抱有一种极为独特的情怀和敬意。因此，当看到徐敏博士带来他所拍摄、编录的《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时，感到由衷的兴奋和激动。

教堂是基督徒举行其宗教礼仪的建筑物，当然也是其心仪向往、流连忘返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教堂展示出其特色鲜明的形象，有着其久远、动人的故事，亦会给人带来精神的超凡脱俗，心态的澹泊宁静。教堂所具有的古朴典雅或秀丽清新，给人带来了对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最好解读。在留学欧洲期间，我曾走访各地教堂，而且有着见景必摄的兴致、遇高必登的执著。这些访游充实了我的知识追求和精神生活，也给我带来了格外的乐趣和收获。在回味、沉思之际，自己曾想过写写关于教堂的学术论著，抒发其引起的遐思和感触，但时至今日这仍是锁在自己心底、憧憬却未实现之梦。徐敏博士的大作，给了我一种圆梦之喜，使我的心愿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和满足。

从世界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是其精神之旅和艺术之道的奇特结合。教堂发展之路曲折复杂，多有心灵呼唤的感召、艺术绝美的感染；其实践者很令人感动，其观察者则会有无限感慨。它见证了宗教精神生活的丰赡及辉煌，给人类文化史留下了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区。

这道风景线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古代犹太教的圣殿、会堂，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及其礼拜场所对基督宗教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犹太教意义上的启迪和传承，使早期基督教会产生了寻找固定地点作为其公众聚会之处的意愿。所以说，“教堂”与“教会”本为同一词，原义即“信仰社团”，其拉丁文词源(ekklesia)之意就是“蒙召者的聚会”，基于希腊文“属主者的聚会”(kyriake)，源自希伯来文“社团聚会”(Kahal)的表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教堂”的本意就是指基督宗教信仰者的社团聚会及其礼仪的场所。这种来源赋予基督宗教教堂独特的神圣性和神秘感。

起初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徒在有较宽敞房间的教徒家聚会，由此形成

最早的“宅第教堂”。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也曾经使他们躲入罗马等城的“地下墓穴”举行宗教礼仪，故有这种地下教堂的奇特景观。我在罗马时曾到当地的“地下墓穴”参观，为其四通八达、绵延数十里的规模所震惊。随着基督宗教被立为罗马帝国国教，其礼仪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基督徒模仿古罗马审案、集会的长方形会堂来建造自己的教堂，创立了其最早的“巴西利卡”教堂风格。因此，“巴西利卡”在意大利等国仍是教堂的基本表述之一。

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教堂建筑在东罗马帝国则呈现为以圆顶、拱形结构为特色的“拜占庭式”风格。在9至12世纪以“加洛林王朝”为主的时期，西欧教堂建筑因模仿古罗马凯旋门、城墙、古堡样式而形成“罗马式”风格，取有“罗马的影子”之意。此时也有了作为主教座堂的“大教堂”，其拉丁文(cathedra)之名意指“主教之座”，而其德文表述(Dom)则源自拉丁文“上帝的居所”(domus Dei)。

自12世纪始，中世纪欧洲率先从法国北部出现“哥特式”教堂建筑，随之在西欧、南欧等地传开。“哥特”原来是日耳曼部族名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此蕴含的“野蛮人”之意来贬称这种艺术风格。不过，“哥特式”教堂以其垂直形框架、挺拔式尖塔和高大宽敞且明亮的彩色玻璃花窗而给人带来向上升华飞腾、优雅飘逸而直入云霄的神圣感觉，被世人称为“屹立在空间的圣诗”“回荡在天际的圣乐”。随着中世纪欧洲的鼎盛发展，“哥特式”教堂在整个基督宗教教堂建设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建筑风格及艺术影响也延续至今。

在欧洲东部，随着东正教传入斯拉夫各民族，其教堂建筑结合“罗马式”和“拜占庭式”艺术风格而发展出“斯拉夫式”教堂，以穹顶式或八角形加圆顶式设计为特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教堂蘑菇群状的圆顶，以雕饰成洋葱头式或椰壳式圆塔建筑而独树一帜。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再到莫斯科等东欧城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教堂建筑发展的连线，经历这段美的历程。

欧洲中世纪晚期又出现了“文艺复兴式”教堂风格，其建筑重新采用了古希腊式石柱和罗马式圆顶穹隆等古代风格，体现出“回归古典”的精神。不过其间出现的“矫饰主义”艺术走向却为后来“巴洛克”艺术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教堂建筑分道扬镳，各自发展，其中新教教堂建筑以“廉”“俭”明快为特点，史称“宗教改革式”建筑；而天主教则以“巴洛克式”教堂建筑来对抗，一度形成豪华、重彩、夸张、离奇的浪漫气派，亦被人指责为大兴土木、铺张、挥霍的奢靡之风。“巴洛克式”教堂建筑经历了其鼎盛和衰落的波动，这种潮起潮落后来退隐为“贝壳形”或“漩涡式”的“洛可可式”教堂雕饰。

当历史发展步入近代之后，教堂建筑则呈现为多元发展之态，给人以异彩纷呈之感。这些后来的教堂包括“古典式”“新哥特式”“新罗马式”“新文艺复兴式”“新巴洛克式”“青年式”“折衷式”乃至“后现代式”等建筑风格，形成今日多种教堂并存、多种风格得以保留之格局。值得指出的是，教堂建筑并不是孤立发展，而是与其相处的整个建筑史密切相关，上述各式教堂建筑风格也渗透到世俗建筑之中，彼此之间有着积极的呼应和互动。

这些教堂建筑样式及其精神意蕴，亦随着近代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传入华夏，绽开中国近代建筑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其在华所建教堂尽管没有达到其发源地教堂建筑的原有规模或艺术极致，却也充分体现出其多元移植、丰富传承的本真，可谓蔚为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国近代教堂建筑历史上，随着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和不同教派的传教士进入中华大地，也就带来了教堂建筑风格、式样的不同，从而在中国建筑主流中涌入了多种潮流，形成了虽看似默然无语，却极为主动的与中国文化的对照、对话。

不可否认，中国近代基督宗教乃颇为复杂的发展，其中既留下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侵华及其殖民掠夺的阴影，亦有着文化交流、思想对话、艺术沟通的阳光。这种以入华基督宗教为特色的中西对话，在教堂建筑上亦带来了创意和更新。其中既有多国建筑的异彩纷呈，也有悄然涌现的中国元素。例如，在抵制教堂建筑“全盘西化”的努力下，中国教堂建筑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和文化元素在相关教堂的建筑上多有体现，并且得到了越来越灵活、自然的运用。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中国教堂建筑中的翘檐大屋顶等典型中国特色元素，其表达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浓墨重彩，是对中国

近代建筑中这种立意的生动写照，也给人留下了基督教会努力“中国化”、在华“本土化”的深刻印象。

对于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徐敏博士在这部《图录》中既有简明、精到的描述，更有图像清晰、色彩鲜明的照片。他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建筑师的敏锐性来捕捉这些重要场景，让对之准确再现的艺术镜头来表述其透彻的话语和无穷的意蕴。我钦佩徐敏博士匠心独到、采摭宏富，完成了这一创意独特的研究项目，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形象、齐全的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资料，也使我们对中国全方位的本土化发展有了颇为实际和可能的构造、鞭策。

徐敏博士擅长建筑设计，尤其在教堂建筑设计上多次获得大奖，是这一领域的青年才俊，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前景。而在基督宗教的探究上，徐敏博士又有极为广阔的视域，在其专业设计之际也开展了相应的学术研究，且迭有新见，引人注目。当前涉及中国基督宗教建筑艺术的著述恰如凤毛麟角，相关研究人才更是寥若晨星，因此迫切需要能有越来越多如徐敏博士这样的后起之秀来参与和开拓，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并带动宗教文化及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化，获得重大突破。抱着这一愿景，我期盼着徐敏博士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能早日出版，并希望在今后的将来也能看到中国现当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的问世。

是为序。

2012年7月3日于北京盛夏

刘伟冬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宗教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而从事宗教传播的传教士们的执着和坚韧也是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难以比拟的。他们是一支用精神武装的军队，不畏艰险，不怕遥远，不怕牺牲，在信念的驱使下把上帝的旗帜插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宗教的传播也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信念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利益的获取甚至是政治的诉求，紧跟传教士步履的往往是军队的马蹄和利剑，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而依靠军队和政府的庇护扩张教会势力的事件在历史上也是不胜枚举。所以，在宗教传播的许多路径和节点上都曾弥漫过硝烟和血腥。只要看一看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明白这一点。

据史料记载，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而大规模的传播则发生在明末清初。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刻。尤其是新大陆的发现更加激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欲望，而富饶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一直是萦绕在西方冒险家梦境中最闪亮的幻影，他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期待和欲望。于是，传教士来了，接着是商人来了；再后，来的就是军队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宗教的传播必然会带来战争和征服，但它的确是最容易被利用和异化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至少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和结果大致是这样的。但任何事情，如同钱币一样都有正反两面，宗教的传播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贡献，它促使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增进各民族彼此的了解，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当年，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传教士在带来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最新的科学成果，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如果康熙不是那样的刚愎自用，乾隆不是那样的狂妄自大，或许中国近代史会有另外的模样和结局。但历史不存在假设，康熙和乾隆对世界的拒绝是必然的，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欲望也是不灭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自此，在屈辱条约以及条约背后的列强军队的保护下，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同时它也更具有政治的色彩。其间，虽有义和团运动对洋教毁灭性的破坏，但随即在更为强硬的条约护佑下，宗教传播之火又迅速

成燎原之势，这种势头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才戛然而止。据不完全统计，到那个年头，中国城市乡村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已有数百万之多，各类教堂建筑，在城市和乡村都随处可见。

可以这样说，西方宗教在中国一百余年所积累的最重要物质遗产就是在各地建造的上帝之家——教堂。这些宗教建筑不仅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同样也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虽以西方元素为基本结构，但同时也融合了东方的精神和技术，有许多建筑堪称中西思想和艺术的珠联璧合；但由于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的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对宗教的态度基本认同了列宁的观点，即一切宗教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自然的，这些旧社会遗存的宗教建筑——所谓的上帝之家和神佑之地——也就彻底地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基础，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它们必然的归宿。在后来极左思潮猖獗的“文革”时期，它们更是被视为罪恶的场所，许多建筑几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重新得以体现，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宗教原有的极端认识开始得到纠正，但其前行的步履依然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的挑战又产生了，不少曾经作为城市地标的教堂建筑遭受了拆毁的命运，而幸存的也早已被淹没在新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失去了原来生存的环境；在广袤的乡村风景中也很难看到那些遗存的旧教堂的身影。经过六十余年的风雨洗礼，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堂建筑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了。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徐敏博士以一个学人敏锐的眼光和严肃的态度深切地关注到这个问题，这当然与他的学习及工作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先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过艺术设计，后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尤其是教堂建筑的修复和装饰，在实践中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2006年他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考察和研究，我对他的选题予以了充分地肯定。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建立相关建筑的数据库；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辞辛苦，广泛旅行，深入实地，收

集数据，拍摄图片，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图录》终于要付梓出版了，那些浸透着他汗水的精美图片和精准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又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使读者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受。我以为徐敏的努力和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使我们的这段历史不至于变成一个传说。

是为序。

2012年10月28日

中国近代建筑不可忽视的重要遗产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概述

徐 敏

建筑是人类社会的编年史，这是建筑界的一个共识。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建筑类型——基督宗教^①教堂，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不可忽视的实物见证。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近代建筑史研究，大多不将这一遍布我国各地的建筑类型纳入研究范围，对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建筑史采取一概抹杀、全盘否定的态度有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开始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王绍周先生在1986年10月召开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讨论会”上正确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时期（1840—1949），中国建筑有了急剧变化，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结构解体，资本主义侵入和发展，开始了一系列的建筑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极不平衡，反映在近代建筑活动上，也呈现出各方面的复杂性。中国近代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错、新老并存、相互影响的过渡阶段。”^②侯幼彬先生在1993年11月出版的《中国建筑史（第3版）》中，也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相互影响的过渡阶段。”^③这些观点，逐渐成为我国建筑史学者的共识。全国各地，特别是像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对我国现存的近代建筑的保护和研究日益重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现在，我国保存完好的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近485座^④，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列入全国或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不少已经成为所在地的一大景观甚至是地标性建筑（如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圣依纳爵堂、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哈尔滨东正教圣索菲亚教堂），是我国近代建筑不可忽视的重要遗产，理应受到重视。笔者结合建筑设计艺术实践和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考察研究》的契机，亲自实地调查了分散在我国各地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对我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从中国近代西方基督宗教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以及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历史意义三个方面，笔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近代建筑史和近代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中国近代西方基督宗教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传教活动是基督宗教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从世界范围来讲，自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几百年的历史是基督宗教传教活动的高峰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是与欧美国家在亚、非、拉地区进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活动以及海外贸易和文化渗透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来讲，早在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波斯的景教僧阿罗本就到达了长安。尽管波斯的景教被基督宗教正统派斥为异端，但这位景教僧的到来，可以说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宗教传教士。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由景教徒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唐初景教在中国流传了146年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基督宗教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到了元代，景教再度兴起，罗马天主教也首次传入中国。元代对基督宗教的各个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教堂被称为“十字寺”。这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第三次传播，则是始于明朝末年、意大利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到中国。由于利玛窦的传教，是尽量适应中国文化，并且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实学”，深受中国有识之士如徐光启（1562—1633）、李文藻（1569—1630）、杨廷筠（1557—1627）等人的欢迎。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并安葬于北京之后，1620年，又有8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他不仅在中国传教，而且是在中国宫廷任职的第一位西方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日益增多，著名的有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1688—1766）、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1715—1774）等。到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仅耶稣会在中国所建的教堂就有159座，教徒人数达24万多人。但是，由于1715年发生了关于中国礼仪之争，清朝康熙帝下令禁止基督宗教传教，直到1842年。这期间的传教活动日渐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各国的基督宗教教会，在西方列强与我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开始了我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1.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失败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之一。

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割占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并可以在这五个通商口岸租地建屋、永久居住。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基督宗教教堂。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除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外,还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从此,西方各国基督宗教各派传教士蜂拥而至,在我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兴建教堂高潮。

据有的学者统计,“鸦片战争前,来华基督教传道差会^⑤不足10个,在华传教士仅约20人,而鸦片战争后,这种传道差会很快增至130多个,来华传教士人数在1845年上升到31人,1848年为66人,1855年为75人,1858年为81人,1860年为100人,1864年为198人,1876年为473人,而1889年时已达1296人。至19世纪末,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已增至1500人,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也从1860年的2000人增为80000多人”^⑥。而在1906年时中国的基督教徒“则比19世纪末翻了一番,增至178251人”^⑦。“在有统计资料的25个省中,有21个省是在1860年至1900年间传入基督教的”^⑧。“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中约有50%来自英国,40%来自美国,其余10%则来自欧美其他国家。”^⑨据《中华归主》^⑩记载,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团体,有130多个不同的传道会,同一长老宗,有英、美、加拿大等之分;同一监理宗,有监理、美以美、循理、美道等之分。详见下表:

基督教宗派系统表一^⑪

圣公宗	浸礼宗	公理宗	信义宗
英圣公会	来复会	公理会	巴色会
坎圣公会	美浸礼会	伦敦会	德信义会
美圣公会	英浸礼会	美普会	丹路德会
华北英圣	孟那福音	协同公会	北美信义
	新约教会		中美信义
	友爱会		芬信义会
	美浸信会		自立信会
	瑞浸信会		长老教会
	安息浸礼		挪美遵道
			信义公理
			豫鄂信义
			信义长老
			挪路德会
			挪信义会
			礼贤会
			瑞美行道
			瑞信义会
			瑞行道会

基督教宗派系统表二^⑫

监 理 宗	长 老 宗	内地会系	其 他
美福音会	苏福音会	内地会	贵格会
循理会	英长老会	德女公会	宣道会
美道会	坎长老会	女执事会	公谊会
美以美会	艾长老会	自由会	美女公会
监理会	纽长老会	德华盟会	使徒信心
美遵道会	北长老会	瑞圣洁会	上帝教会
圣道公会	南长老会	立本责会	弟兄会
循道会	归正教会	挪华盟会	美基督会
	复初会	挪华盟会	五旬会
	约老会	北美瑞挪	南直福音
	基督同寅	瑞华会	复临安息
	苏长老会	瑞华盟会	瑞美会
			救世军

侵略式的传教方式,使19世纪后半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教案多发期。“在中国教案史上,与天主教相关的教案较多,但不少教案则直接涉及到基督教。”^⑬义和团运动中,“在华基督教堂约3/4被毁”^⑭。之后,在华基督教会开始反思和总结其在中国传教的经验与教训。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传教士为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消除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实现其宗教精神及道德修养对中国人的浸染,通过教会广泛兴办教育、开办医院、赈灾济贫等公共慈善事业建设,逐渐扩大基督教的在华影响。教会大学的兴建,在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施医施药发展到开办医院、赈灾济贫和公共慈善事业的开展,逐步改变了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印象。

20世纪初的20年间是中国基督教迅速发展的时期。之后,受中国国内战争和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的非基督教运动^⑮的影响,西方教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受到一定的阻碍。这一时期,基督教开展了本色化运动,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从而出现了一批自养堂或半自养堂,经费自筹或只由外国差会部分补贴。本色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合一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当时全国共有自立会达600多处,基督徒人数由20世纪初的8万人,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发展到36万多人。”^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外国传教士纷纷离境,本土传教士也减少了许多,教会事业陷于停顿,教堂建筑也受到重大破坏。但是抗日战争期间,不少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很大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不少人对基督宗教的看法而接近基督宗教。因此,抗战结束时,慕道教友约增加30%。

1946年12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提出了三年奋进运动。在此推动下,发

展了不少信徒，“到1949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由1936年的53.6万人发展到83.5万人”^⑩。

至此，基督教传教运动遍及全国各主要省、市及少数民族地区。详见基督教传道区域表：

基督教传道区域表^⑪

年份	会 别	创立者	始立地点	传道区域
1807	伦 敦	马礼逊	马刺甲	澳港 江浙 河北 湖北 厦门
1830	公 理	裨治文	广 州	粤东 福建 华北
1830	礼 贤	郭士立	澳 门	香 港
1830	巴 陵	郭士立	澳 门	广东 博罗 惠阳 韶关
1835	美圣公	骆韩君	爪 哇	江苏 湘鄂 皖赣
1836	浸 信	叔未士	澳 门	广东 江苏 华北
1838	北长老	骆韩君	新加坡	关东 华北 闽南 东广东 西广东
1842	归 正	雅裨理	鼓浪屿	龙岩 漳平 永福 华封 宁洋
1843	浸 礼	玛高温	宁 波	宁波 金华 绍兴 杭州 湖州 上海
1846	巴 色	黎力基	香 港	香港 广东
1847	安 息	卡华二君	上 海	上海
1847	美以美	柯林斯	福 州	华中 江西 华北 华西 福州 兴化 延平
1848	英圣公	戈 柏 陆 赐	宁 波	浙江 福建 港粤 华北 山东 四川 湘桂
1848	监 理	秦 右	上 海	上海 苏州 常州 湖州 松江 太仓南
1850	英长老	用雅各	厦 门	闽南 关东 两湖
1852	循 道	柯克私	广 州	汉口 武昌 湘阴 平江
1860	圣 道	郝 廉	天 津	天津 甬瓯 肇庆
1864	南长老	应斯理	宁 波	江苏 浙江
1864	美公理	儒 理	北 京	1909并于美普会
1865	内 地	戴德生	杭 州	浙江 江西 安徽 湖南 山西 贵州
1867	美 普	马维廉	张家口	青圪塔 蔚县城
1878	苏长老	郭布伦	宜 昌	宜都 董市 双莲寺
1880	英浸礼	仲均安	徐 州	青州 开封 济南 汾州
1882	福 音	祝名扬	上 海	铜仁
1886	基 督	马 林	南 京	南京 滁州 庐州 芜湖 南通
1887	美瑞丹	宽 伦	广 州	南海 香山 高要 博罗
1887	贵 格	义白理	南 京	南京
1887	瑞 华	符励恺	河 南	山西 陕西 河南

1888	宣 道	赖 普	武 昌	长沙 常德 汉寿 武昌 甘肃 蒙古 梧州
1889	同 寅	梅 灵	广 州	新塘 小榄 大杭 九洲 基古镇等处
1890	德华盟	奔 德	处 州	丽水 松阳 缙云 龙泉 抚州等处
1890	行 道	韩宗盛	武 昌	武昌 沙市 荆州 黄州 襄阳 南漳
1890	信 义	李立生	汉 口	关东 豫鄂 豫东 豫中 兴安 溁口 广东
1891	北直隶	爰 君	宣 化	保安州 多伦 张家口 下花园
1892	英 美	赫斐邱	成 都	成都 重庆 涪州 自流井
1893	协 同	孙芝城	兴 平	咸阳 马嵬等处
1895	救世军	罗开泰等	源 昌	双门底
1897	约 老	梁多马	广东德庆	德庆 罗定 云浮 太平等处
1898	来 复	慕向荣	南 京	南京 和县 芜湖
1898	圣 洁	高乐生	山西浑源	庄窝 西沟等处
1898	酬 恩	李道辉等	山东登州	山东 后合并于长老会
1899	恩 典	金乐满	浙江塘栖	1922年合并于 杭州长老会
1900	德妇女	吴香珠	四 川	万县 开县 岳溪等处
1900	复 初	海维理	岳 州	辰州 永绥 湖滨 长沙 湘潭 常德
1902	基督徒	谢洪赉等	上 海	上海 香港
1902	遵 道	德慕登	湖 南	长沙 醴陵 湘潭 攸县 茶陵 枣阳 桐柏
1903	同 盟	王耀基	陕西商县	龙驹寨 山阳 雒南等处
1904	循 理	安培生	四 川	郑州 开封 荥泽 杞县 河阴 荥阳 陈留
1905	自 立	俞宗周	上 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北 湖南
1907	救 恩	挪心清	河南泌阳	泌阳
1908	友 爱	库 范	山西太原	平定 寿阳 辽县
1910	自 理	甘素贞	云南楚雄	楚雄 姚安 牟定 盐丰 大姚
1910	坎圣公	怀伟廉	河 南	开封 商邱 郑州 兰封 虞城 睢县
1911	清 洁	薄清洁	直隶濮阳	大名 濮阳 清丰 车明 南乐 长垣
1911	孟挪浸	卫英士	汕头上杭	上杭 永定
1912	海面传道	何丽臣等	香 港	香港 广州
1912	中华基督教	孟省吾等	北 京	天津 北京 烟台 青岛 济南 太原 星洲
1917	滇南教	富力敦	云南猛烈	普洱 思茅 墨江
1917	五旬节	马锡龄	云 南	蒙自 緬宁及卡瓦山 裸黑族 白苗族中
1921	国内布道	李素贞等	云 南	云南 黑龙江

2.中国近代天主教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鸦片战争前夕,虽然清朝政府禁止基督宗教传教,但由于当时清朝国力虚弱基本无暇顾及禁教,致使许多传教士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活动。据统计,当时有天主教徒20余万人。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被查禁一百多年以后终于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再度复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保护了传教士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内地传教。自此,各国天主教修会^⑮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到中国。各教区先后收回过去被没收的教堂或租买田地建造新堂,并相继成立修道院和各种辅助传教机构。

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迅速发展。1842年,全国大约有外籍神甫50余人,中国籍神甫80余人。至19世纪末,约有传教士400人,教徒74万人。天主教主要修会或外方传教会先后来华的有: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详见下表:

天主教各修会来华表^⑮

年 份	会 名	传 道 地 点
1842	耶稣会 (重来)	江苏、安徽、河北东南部
1858	密良外方传教会	河南
1865	圣母圣心会	蒙古
1870	教学会	香港
1879	奥斯定会 (重来)	河南
1879	司带尔圣言会	山东一部
1883	苦修会	河北杨家坪
1885	圣伯多禄圣保禄会	陕西
1893	圣母小昆仲会	上海
1902	慈幼会	澳门
1904	巴尔玛外方传教会	河南
1917	伊苏登外方传教会	贵阳
1918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	广州江门
1920	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	汉阳
1921	苦难会	湖南辰州
1922	比布斯二心会	琼州
1922	圣心司铎会	云南大理
1923	救世会	福建邵武
1925	本雪尔凡尼的本笃会	北平
1925	印五伤司铎会	河北易县
1925	司格包罗勃姆夫外方传教会	浙江处州
1925	开培克外方传教会	辽宁四平街
1926	洛本的本笃会	四川西山
1926	方济各特规会	陕西兴安
1926	白冷外方传教会	黑龙江齐齐哈尔
1928	奥斯定重整会	河南归德
1928	赎世主会	河南驻马店
1928	圣奥迪尔的本笃会	吉林延吉
1928	圣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会	安国 (华人自立)

1930	主徒会	宣化 (华人自立)
1933	奥斯定常律会	西藏
1933	圣母心子会	安徽徽州

主要女修会有:仁爱会、沙德圣保罗女修会、加诺萨女修会、拯亡会等。详见下表:

天主教来华女修会表^⑯

年 份	会 名	工 作 地 点
1842	仁爱会	
1848	沙德圣保罗女修会	
1860	加诺萨女修会	
1867	拯亡会	
1869	圣友会 隐修会	上海
1875	包底欧上智会	
1886	方济各圣母传教会	
1889	多明尼女修会	
1904	安老会	上海
1905	司带尔圣神忠仆会	山东兖州
1909	加拿大圣母始孕无玷会	广州
1910	埃及方济各女修会	湖北老河口
1920	玛利诺多明尼外方传教修会	香港
1920	山林圣玛利亚上智订会	河南开封
1922	包勒杜玛利若瑟会	热河
1922	勒奶维尔天神母后会	贵州贵阳
1922	圣若瑟小姊妹会	山西潞安
1922	罗马圣岛苏拉会 罗马联合会	广东汕头
1923	南林劳莱笃会	汉阳
1923	圣母进教之佑会	广东韶州
1923	鲁文奥斯定会	宁夏
1924	加拿大保血会	河北献县
1925	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会	湖南常德
1925	吾主仁爱会	湖南辰州
1925	方济各会服务医院会	山东济南
1926	圣高隆庞传教修女会	汉阳
1926	毕资堡圣若瑟修女会	辰州
1926	圣母赎虏会传教修女会	芜湖
1926	加罗萨圣母会	献县
1926	耶稣圣心会	上海
1926	圣心会修女会	浙江嘉兴
1926	救世主会	福建邵武
1927	巴尔玛岛苏拉圣心会	安徽蚌埠
1927	卢森堡方济各第三会仁爱会	湖南永州
1928	奥斯定重整会	归德
1928	永久朝拜方济各会	武昌
1929	沃海圣若瑟山仁爱会	武昌
1929	圣十字架修女会	齐齐哈尔
1929	巴伐利亚方济各萨拉诺修女会	山西朔州
1929	奈缪圣母修女会	武昌

1930	美国本笃会修女会	甘肃平凉
1930	嘉布遣会第三会圣家会	
1931	门斯德圣母始孕无玷会	山东济南
1931	耶稣孝女会	安庆
1931	善牧会	上海

天主教各传教修会，不像基督教圣公宗、浸礼宗、公理宗等各树一帜，不相统属，天主教内的传教会，只是修士团体，都在唯一天主教公教教会以内且内部组织机构严密，并有着完备的教阶制。

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活动是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强行姿态进入中国，这种带有侵略式的传教方式与政治侵略紧紧交织在一起，致使19世纪后半叶成为中国历史上教案发生最多的时期，大、小教案多达1500余起，较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1886年至1898年间的3次四川大足教案。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教案中，涉及天主教的教案较多。据史料记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堂就损失约3/4，仅据北京的统计，被焚的教堂18所，男学堂12所，女学堂11所，传道学堂4所”^{②3}。天主教会受到重创。

侵略式的传教方式，宗教矛盾与政治侵略紧紧交织在一起，是这一时期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矛盾，是引发教案的原因之一；盲目的排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强化，这是引发教案的原因之一。

20世纪初，天主教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相应改变了传教方法。首先是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避免卷入诉讼争端而激起公愤；同时扩大文化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创办学校，扩大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此外还开办印书馆，出版定期刊物30余种。新建的教会建筑，大都融入了中国样式，出现了中西合璧式教堂。教区的名称，一律改用中国地名。并且，天主教会还注重培养中国神职人员。1926年，首批中国主教6人在罗马祝圣，从此教会推出了多位中国籍主教。天主教的这些变革，同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在方向上是一致且同步的。鉴于上述各项应变措施，“天主教在20世纪初发展得很快，1935年中国天主教教徒发展到290万人。1946年，罗马教皇擢升青岛主教田耕莘为枢机，并于翌年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全国设20个总主教区。至1948年，全国约有5800名神甫，其中中国神甫约2700名。此外，还有7400余名修女。教徒有320余万人”^{②4}。

3. 中国近代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帝国利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到了自由居住、自由传教等特权，并同时强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东正教会也扩展到了中国内地。但由于东正教教会始终保持了“侨民教会”的特点，所以至1900年，在中国接受东正教、受洗入教

信徒仍为数不多，据有关资料记载，至多不超过500人。

义和团运动中，东正教会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北京同天馆老爷庙的东正教堂和张家口的东正教堂都被付之一炬”^{②5}，“总人数为700人的东正教徒中有200人被杀”^{②6}。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沙俄将《辛丑条约》中的部分赔款用于传教事业，致使东正教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展。天津、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建造了东正教堂。“据粗略统计，1900—1917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在华修建了37座教堂，建立了40多个传教点，创办了1所神学院和20所男女宗教学校。此外，传教士团还兴建了气象站、图书馆、印刷工厂、工厂、作坊、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公墓等共计46处，资产总值为150万卢布。截止到1916年，中国领圣体的教徒总数达5587人，其中北京有1000人，天津有200多人。”^{②7}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华的传教士团于1922年宣布断绝和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宣布改称“中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失去了沙俄政权的政治及经济支柱，其教会实力有所减弱，但随着大批白俄流亡至中国以及国际宗教组织的支援，从1917年至1949年期间，东正教在华的势力却兴旺起来，发展也相当快。“在华北地区，教堂由北京的2座增加到10多座，仅天津就增加了5座，而且形成了教区，信众多达5000人。在河北许多县城也设立了教堂，个别县发展教徒竟达600人之多。在东北地区，教堂由几十座增至上百座，神职人员由100人左右增加到几百人，信众由几千人猛增到30多万人（多数教徒为俄国人），因而形成了一个自齐齐哈尔沿中东铁路至大连的大教区。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有教堂若干座。新疆的教堂设在乌鲁木齐、塔城、伊宁、水定、霍城等地，也形成了一个教区。教区大主教由北京传教士团委派，教徒人数最多时达1万人。在华东地区，1917年后东正教也有大发展，例如在上海市区先后修建了多座教堂，而且很快形成了教区。又如在山东青岛建立了索菲亚教堂、圣鲍切诺夫斯基教堂和崂山疗养院，疗养院是专供传教士休养的地方。此外，东正教会在浙江的杭州、宁波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传教点，发展了几百名教徒。在华中地区，传教士团也极力扩张力量，发展教徒，建造教堂，兴办学校。例如在湖北汉口修建了1座教堂，在河南卫辉建造了1座教堂，兴办了1所学校。在湖北和河南发展了1360名教徒。”^{②8}

1858—1949年，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共设立了6个教区，分别是北京东正教总会、哈尔滨东正教会、天津东正教会、上海东正教会、汉口东正教会、新疆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传入中国的近300年中，俄国政府共向中国派遣了二十届传教士团，致使中国的东正教会长期隶属于俄国东正教会，故中国近代东正教堂的建筑风格也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建筑风格的影响。

由于在中国的东正教始终保持“侨民教会”主要在俄国人和俄国裔中信奉的特点，故其教会势力和教堂建设远不及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与基督教。

二、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基督宗教教堂是基督宗教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物。教堂(Church)一词源于希腊文Kryiakon,意为“主的居所”。公元392年,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从最初秘密的“地下教堂”开始到公开建造教堂,这时大多由宫殿改建或仿宫殿式样建造。以后先后产生了罗马风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式等教堂。东正教则有俄罗斯拜占庭式教堂。中国最早的教堂为唐代景教在长安所建的大秦寺。元代天主教教堂称为“十字寺”。明代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造教堂,初名“仙花寺”,后改“寺”为“堂”。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常称为“礼拜堂”。国内天主教教堂,一般称为“天主堂”。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有明显的不同,故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1.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如前所述,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各国、各基督宗教修会及差会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依仗西方列强与我国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19世纪下半叶兴建的中国基督宗教教堂,无论是在兴建的速度、数量上,还是教堂的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的特点是,西方基督宗教教堂的各种样式,如拜占庭式、罗马风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式等都很流行。其中,以天主教堂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将纯正的欧洲中世纪样式教堂建在中国内地,其中既有古典柱式、厚实墙、圆形的穹隆、半圆形的拱券和层层叠叠的连拱柱廊,又有尖塔钟楼、尖顶拱券、飞扶壁、彩色玻璃玫瑰花窗和大量堆砌的装饰,还有自由、动态、富贵的装饰和雕刻以及大量的曲线、凹凸起伏的线脚和涡卷。在这一时期建造或改建的著名天主教堂有北京东交民巷天主教圣弥厄尔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圣方济各堂、济南将军庙天主教圣母无染原罪堂、重庆天主教圣若瑟堂、宁波天主教耶稣圣心堂、广州天主教耶稣圣心堂等等。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天主教堂建筑的风格,西方文化特征明显,艺术价值较高,保存至今且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建筑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的实例。

与天主教堂相比,这时期中国基督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是崇尚俭朴之风,突出简洁明快的风格特征。在教堂建筑式样的选择上,基督教并不重视建筑的外在形式,而更注重教会传教活动的开展。在选择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方面,中国近代大多数基督教堂选择了当时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样式。上海基督教圣三一堂、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厦门鼓浪屿基督教协和礼拜堂、蓬莱基督教堂、闽中基督教福音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中国近

代基督教堂的艺术魅力不如天主教堂,建设水平及建筑的细节处理也略逊一筹。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亦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内地展开,但由于经费不足等诸多原因,传教活动的进展不大。据有关文献记载,到19世纪末,在中国接受东正教受洗入教的信徒至多不超过500人。在此期间,仅在张家口、汉口修建了两座东正教堂。

2.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19世纪末,中国各地的教案开始增多,带有文化侵略特点的传教方式,殖民式的教堂建筑,最终引发的只能是国人极大的抵触和抗议。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摧毁了大量的教堂。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在华的教会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争取中国民众和官方的认同和支持,各宗派教会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传教策略,传教活动逐渐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在教堂建筑方面,传教士选择了兼具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与西方古典建筑样式的风格,开始进行了一种在文化认同上的努力。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认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②7}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②8}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宗教运动的开展,在华的外国教会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华的基督宗教教会迅速作出了“本土化”“本色化”的回应,即大力推行“中国本色教会”。一方面让中国信徒出任教会主事,另一方面从神学思想上去除西方文化色彩,力求基督宗教的教义、礼仪、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基督宗教消除“洋教”的这一名号。随着“中国本色教会”运动的开展与深入,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教堂建筑方面,开始走向转型和中西融合之路,中西建筑体系在教堂建筑上由碰撞、摩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中部分地选择了中西合璧样式。这些教堂建筑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正立面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横向三段式构图或西方古典建筑竖三段式构图,塔楼具西式教堂的特征,细部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很多教堂的翘檐大屋顶使整个建筑样式定位于中式风格。清水砖墙、中式楹联、木本色门窗



等等均具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北京基督教中华圣经会、上海基督教鸿德堂、青岛青和路基督教堂、杭州基督教思澄堂、苏州吴江黎里天主教堂、大理天主教堂等均属这类教堂。这些教堂的外观从整体上看是中国传统风格,但很多细节又是典型的西方古典装饰处理手法。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政府将《辛丑条约》中的部分赔款用于传教事业,其传教范围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展。但由于在华的东正教会基本保持了侨民教会的特点,故其教会的规模及教堂的数量远不及当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一时期建造的教堂有哈尔滨东正教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天津东正教圣母帡幪堂、上海东正教圣母大堂等,建筑风格均保持了纯正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极少,其建筑艺术价值较高。

三、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历史意义

建筑是人类社会的编年史。中国近代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印证着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步伐,丰富了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中国近代史优秀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同时,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它们对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建筑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特点及其演变,对于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借鉴、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是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的基督宗教教堂,虽然不是从近代开始的,但近代的这一百多年是兴建基督宗教教堂的高峰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多样,成为中国近代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建筑类型之一。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岁月,至今仍保存比较完好的基督宗教教堂,大多已被列入全国或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例如,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广州天主教耶稣圣心堂,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奠基,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建成,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座哥特式教堂,是参照法国巴黎圣母院设计的,整座教堂气势宏伟,装饰精美。同样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建于1904年,是典型的近代折衷主义教堂。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哈尔滨东正教圣索菲亚教堂(1923—1932年建),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拜占庭式东正教堂,可容纳2000人,是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堂风格。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教堂还有北京西什库天主教救世主堂、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圣母得胜堂、天津基督教安立甘堂、哈尔滨东正教圣母帡幪堂、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圣依纳爵堂、上海基督教沐恩堂、香港圣公会圣约翰堂、澳门天主教主教座堂等等。总之,现存的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

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而且具有不同程度的艺术价值。

2.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是传播西方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的重要载体

虽然早在1840年以前,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基督宗教教堂,但其它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与我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在我国各地大量兴建各种艺术样式的基督宗教教堂以及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教会建筑,使长期在闭关锁国政策下的国人突出地感受到了西方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和先进的建筑技术。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人并未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时兴建的一些教堂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色彩,加上中西文化差异和当时的一些政治因素,使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排外的情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就是明显的实例。但是,从历史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国人比较突出地接触西方的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应当说就是从近代的基督宗教教堂开始的。

3. 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转型和近代建筑工业的发展

首先,西方教堂建筑的单体造型特征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立面造型。中国传统建筑的单体造型主要由台基、屋身、屋顶组成,长期以来一直以横向三段式构图作为传统的立面。而西方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单体造型是纵横三段式立面构图,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横向三段式构图不同。这种建筑立面构图方式给中国建筑师以新的启发,促进了中国近代建筑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进行新的探索。

其次,西方基督宗教教堂建筑改变了以群体组合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中国传统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遵循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即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位,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并且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群体之间,主次分明。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的群体建筑以教堂为主体,其附属建筑较之于主体建筑要简化得多,其中一部分是没有围墙的建筑群体。这些建筑之间的组合关系没有固定的法式,但讲求经济实用、比例均衡,同时注重形式美。这种布局方式既体现了西方建筑的特点,又满足了当时宗教的快速传播和教堂建设的需要,它为中国近代建筑探索新的布局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再其次,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基督宗教教堂,由于西方传教士吸取了历次教案的教训,为更好地传播基督宗教文化,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采取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教堂建筑中的运用,首先倡导并建设了一批中西合璧式教堂。20世纪初,由教会医院建筑特别是教会大学建筑兴起的中西合璧式风格,由于它